

严 复 孙中山
康有为 章太炎
谭嗣同

中华民族 杰出人物传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

第九集

孟庆远 主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国风
封面设计：宁成春
插图：于绍文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9)

孟庆远 主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1.25印张 210千字

1991年7月北京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3.95元

ISBN 7-5006-0873-x/K·127

69427/6

编者的话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中华民族的繁荣进步，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出过贡献，得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为了帮助广大青年熟悉和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事迹，继承和发扬我国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这一套传记读物。本书是其中的第九集。

《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第九集，介绍了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和章太炎的事迹，是一本通俗的历史人物合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孟庆远同志主编，由郑一奇、辛智、王世义、胡绳武、戴鞍钢、姜义华同志撰写。

一九九〇年九月

目 次

严 复.....	郑一奇	1
康有为.....	辛 智	43
谭嗣同.....	王世义	116
孙中山.....	胡绳武 戴鞍钢	157
章太炎.....	姜义华	280



严 复

郑 一 奇

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来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 从苦读少年到海军学校校长

在福建侯官的一座小木楼上，一位塾师正指导一位十一岁的少年读书。可是楼下的邻居却喜好看戏，请来一个戏班

子在楼下锣鼓喧天地唱开了。老师无法教，学生也无法学下去。他们只好商定：听到楼下锣鼓一响，两人就闷头睡觉，等戏演完了，再点灯夜读。大戏唱了一个多月，他们天天晚上坚持先睡后读。这位执教甚严的老师叫黄少岩，很有学问，著有《闽方言》等书。从他深夜苦读的少年，就是本篇要介绍的严复。

严复一八五三（咸丰三年）生于福建侯官，祖籍河南固始，唐朝时由中州入闽，家居侯官阳崎。“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是风光秀美之处。严复并无十分显赫的家世，只是曾祖曾为嘉庆时举人。父亲叫严振先，是乡间儒医。严复的母亲是“布衣”的女儿。但是严复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却抓得很紧，七岁时“始就外傅，先后从师数人”，启蒙教育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一类。家境虽不宽裕，十一岁时，父母又聘同邑布衣黄少岩为严复的家庭教师。黄老师对严复要求很严，因此严复自小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课经之余，黄老师还好与严复讲明代东林掌故。可惜的是，这位黄老师两年后就病故了。更为不幸的是，又隔一年，即严复十四岁时，他的父亲也去世了。“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耘。上掩先人骼，下抚儿女大”。因家庭生活凄苦，眼看严复就要失学了。

可巧，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福州马尾刚创办的一所海军学堂招生。招生章程上写明：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的，可领赏银十元，五年毕业后还可优薪录用，“照外国监工船主薪工银发给”。严复知道后，非常高兴，看来天无绝人

之路，只要考取，不仅可以免费读书，还有一点收入，这对家境贫寒的严复，自然是最佳选择了。

这所学校为什么不收费，还发补贴？原来，当时洋务派办洋务，除兴办一些新式军事工业，还办了一些学堂，以培养能掌握新式军工技术的人才。但当时阔人家的子弟，都要走科举的“正路”，从秀才、举人、进士一步步爬上公卿之位，不屑进洋务派办的新学堂。洋务派所办学校，为招揽人才，只好规定许多优待办法，来吸引寒庶之家的子弟。

严复去报考船政学堂时，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因父亲刚去世，非常悲痛，看到这个题目，感触很多，文章自然写得好。主办学校的船政大臣、同乡沈葆楨非常赏识他，以第一名录取了严复。

严复的别名很多，最初名传初，后改名体乾，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登仕籍时又改名复，字几道，晚号癡璜老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又别号尊疑等。

严复入船政学堂时仅十五岁，从这时到十九岁毕业，一共读了五年。“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这些都是“西学”——由资本主义国家传入的新学问。虽然在这所学堂中也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文理”，但主要的是接受新式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海军的专业知识。当时船政学堂还在草创阶段，条件艰苦“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但学生学习都比较刻苦。学堂的正、副监督为法国

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严复十九岁时以最优秀成绩毕业了。毕业后，他与同学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林永升等十八人被派往“建威”号练习舰上实习，先后巡航南至星加坡、槟榔屿，北至直隶湾、辽东湾各地。二十岁时（一八七二年）又登福建船厂新制成的五舰之一“扬武”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当时日本也刚建海军，“扬武”舰驶至长崎、横滨等地，“聚观者至数万人”。“扬武”舰舰长为英国人德勒塞中校。他任满将归时，对严复说：“你对于海军学术，现在已毕业了”，“积年相处，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相赠，谈到学问，不能以学校毕业为终点，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你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希望你以此勉励自己。”严复听了很受感动，此后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舰长的忠告，不断追求无尽的新知。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勾结美国侵略台湾，严复曾随船政大臣沈葆楨到台湾测量台东各海口，并调查当时军事情形。经过这样五年的实际锻炼，严复的见闻经历大大丰富了。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在他二十四岁时，被清政府派往英国留学。

严复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到英国，一八七九年回国。这一段时间虽不长，但对严复一生思想的发展成熟却关系甚大。严复是继詹天佑等之后，清政府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之一。这批留学生都是从福州船厂派出的，主要去英、法两国学习，凡学造船的派往法国，学驾船的派往英国。严复即是到英国留学的。以后，严复这批留学生回国，多在海军工作，甲午海战中几艘主要军舰的管带（舰长），如刘步蟾、林泰曾、方

伯谦、林永升、叶祖珪等都是严复留学时的同学。

严复在英国，先入抱穆士德学校肄业，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中间曾赴法国游历。留学期间，严复主要学习“高等算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术”，考试成绩屡列优等。严复和他的同学不同，没有花过多的时间上舰实习，而是着重在学校中学习。为了更加广泛的了解英国的社会状况，他曾到英国法庭观看审判案件，观后感触很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他还到英国国会听议员辩论，到居民区参观基层社会组织，并参观工厂、学校、天文馆、博物馆、军队、商店……。他经过认真思索，认为英国和欧洲各国所以富强的原因，在于英国等国的司法制度完善，使“公理日伸”。他认为西方的立宪政治——“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使西方“和同为治”，把西方人民培养成“合亿兆之私以为公”的爱国者。而中国实行的是专制政治，不许人民参预政治，这样上下不一心，人民成了受驱使的苦力。这样率东方的“苦力”与西方的“爱国者”作战“断断无胜理也”。可见严复学习的目的不限于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海军良将，而是开始在比较东西方政治制度之不同，在探索中国复兴的根本出路了。严复到英国留学，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时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全盛时期，使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出来的严复不能不倾心向慕，对之作理想化的介绍，而不见其阴暗之处。严复当时已开始阅读许多杰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等人的著作。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更使他赞赏不已。

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研究和对社会的观察，曾引起清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重视。比如严复对司法制度的看法，郭嵩焘就“深以为然”。郭嵩焘一向自命了解世界大势，但经过交往，对严却深为推重，两人“引为忘年交”，互相讨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后来郭嵩焘还写信给清廷“枢近某公”，荐举严复说：今后再派人出使英国，“惟严君能胜其任”。像我，既不识英文，又不知世界大势，怎么能担当此任呢？虽然“某公目以为狂”，置之不理，但可以说明严复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已有了直接和广泛的了解。

一八七九年六月（光绪五年五月），严复留学毕业，当时福州船政学堂需要教师，经船政大臣吴赞诚聘任，他回到母校任教员。

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另外创办了一个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又调严复去任总教习（教务长），这年严复仅二十八岁。北洋水师学堂与福州船政学堂性质有所不同。福州是造船与驾驶两科并重的，也就是工科与海军的混合学校，而北洋水师学堂则专重驾驶，是一个专门的海军学校。严复开始名义上是总教习，实际上却担负了总办（校长）的责任。任职九年后，三十七岁时他又任会办（副校长），第二年升任总办（校长）。到四十岁时，严复才得以从“选用知府”，升“选用道员”。这样，他就以四品衔的水师学堂总办，与京津一带的官僚交往。在北洋水师学堂工作的这段时间，严复常常往来于京津之间。“朝之硕臣，及铮铮以国土自期许者，咸折节争集先生之庐”，

他们常常在水师学堂议论时局和朝政。严复从中了解到朝野的腐朽，非常痛心。再看东邻日本，同在英国留学的日本同学，回国后“皆用事图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侵略我台湾，又吞灭琉球。严复常对人说：“这样下去，不到三十年，中国的领土与藩属都会被吞灭殆尽，那时中国就像一头老牛一样，任外国侵略者牵着鼻子走了！严复的这些爱国言论，传到了李鸿章的耳朵里，李鸿章也“患其激烈”，对他逐渐疏远了。史载，李鸿章尽管后来派严复为水师学堂总办，但却使之“不预机要，奉职而已”，并不重用。

严复身为海军学校校长，却不能真正为振兴中国的海军出力，很是苦恼。他深知问题的根由不在海军，而在于当时朝政的腐败。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来津后……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指自己）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他的堂弟曾劝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还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属上司。他听了也只好去走动走动，后来李鸿章果然对严复表示关切。“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毕竟不是个靠走门子图升官的人。在甲午战争前十年中，严复屈尊纡贵，还打算通过科举，打通仕路，创造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三十三岁（一八八五年）、三十六岁、三十七岁、四十一岁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得中，看来此路是不通了，于是又陷入苦闷之中。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严复四十二岁时，中日甲午

战争爆发。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海军基地旅顺、大连、威海卫相继失守。中国形势大变，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对严复刺激很大，使他从科举致仕的迷惘中清醒过来。他看到祖国危在旦夕，再不能走过去的路了，而是应当与维新爱国志士一起，通过文章言论，大声疾呼。由于严复对中西文化有深刻了解，对世界大势有所分析，他开始成为维新运动中的一个出色的启蒙思想家。

二 提倡新学，反对旧学的 出色理论家

甲午战争所造成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在当时是空前的。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了。在日本马关（今下关）春帆楼与中国签订条约的伊藤博文也是早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伊藤博文屡受重用，一八八五年后连任四届内阁总理。就是他筹划了这次中日战事。而代表清政府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正是洋务派的首领人物李鸿章。《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这使全国人民，特别是一部分具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感到，祖国前途的危机即在眼前，都在思索洋务运动破灭的原因和寻找拯救危亡的根本出路……

就在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甲午战败后，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提

出拒签和约、迁都西安、练兵抗战、变法图强的四项主张，自此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在维新运动推动下，光绪帝采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颁发了几十道变法诏令，提倡私人举办工商业，奖励官民发表政见，创办学堂，裁并机构，废除八股等等。这就是著名的“百日维新”。严复在整个维新运动中是传播维新思想，提倡新学（西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从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到一八九八年即甲午战争后到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间，严复的活动主要是做了以下三件大事：第一是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第二是翻译了《天演论》，这使严复成为在当时，并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的人物。第三是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并撰写主要社论。

下面我们先介绍严复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四篇重要论文：

《论世变之亟》是一八九五年二月四日至五日刊登在天津《直报》上的。这是严复提出维新思想的一个重要引论。

从文章标题看，这篇论文是讨论当时社会为什么变化会如此急迫的。实际上是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来探讨中国为什么会由强变弱，进而探寻中国由弱返强的根本出路的。

文章一开头，严复就大声疾呼：“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上溯两千年，历史的变化动荡，从未有像今天这样急迫的了！严复认为这种变化的原因尽管

一时还说不清，但可以称之为“运会”，“运会既成，圣人无所为力”。也就是说在历史潮流的演进面前，即使是圣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圣人也只是潮流中的“一物”，是不能扭转潮流的。作为圣人，应当是能知道潮流的由来，并预见它的去向，顺应潮流前进，不与潮流相违背。所以考察中日甲午战争之胜败，不能只限于当时当事，中国战败，绝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是有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的，要从是否顺应历史潮流来考察！

严复接着指出，中西文化之不同在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圣人认为的“生民之道，期于相交相养而已”是排斥竞争的。圣人认为，“一统者，平争之大局也”。所以中国“人人尊信之书”“其道常在若远若近，有用无用之际”，因而造成民智日弱，民力日衰，以至不能抵抗外国侵略，不能“与外国争一旦之命”。他大声疾呼：中国四千年的固有文化，已像冰块化解一样岌岌可危。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病因是很深的了。

他指出，即使到了这样危急的地步，一呼吁学习西方，仍常常被人诬为“誉仇而背本”，即赞扬敌人，背叛祖国，其实这是堵塞自己的聪明智慧，自欺欺人。他指出，学习西方，不能只学西方的“汽机兵械”“天算格致”，更主要的要抓住“命脉”，即学习西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前者指学习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术，后者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这里蕴含了学习西方即要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雏形。严复还认为，

要提倡科学与民主则要提倡自由。他认为西方在这两方面“常通”，而中国却“常病”，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

他认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正因为如此，中西文化多所不同：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

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

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

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

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用财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

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

严复深刻地指出，当时学习西方最大的障碍在于朝廷中的当权者，他们宁愿坐视自己的国家趋于危亡，也不愿丢掉自己哪怕是一瞬间的富贵。甚至认为“危亡危亡，尚不可知。即或危亡，天下共之”。严复尖锐地指出，再这样下去，“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

严复指出，中国之所以外患频仍，危急万分，全是由于封建统治者顽固不化，拒绝革新，违背历史潮流所造成的。这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他提出要使中国转祸为福，变亡图存，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学习西方，变法革新，否则中国就要亡国灭种，不可收拾了。

《原强》最早发表在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四日

至九日的天津《直报》上。《原强》的题意就是要探求国家富强的根本道路。这是严复在戊戌变法前，鼓吹维新变法，并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主张的重要论文。

论文一开头赞扬达尔文^①的进化论是“一新耳目，更革新思”，接着赞扬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②，认为他的功绩就在于能以达尔文在生物科学中所发明的进化原理，普遍应用于万事万物，特别应用于社会科学。严复根据斯宾塞的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一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即力、智、德三者的高下。他认为“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国民懦弱、愚昧，“各奋其私，则其群将涣”。“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

严复用这三个标准来考察当时的中国，认为情况令人痛心。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以寥寥数舰”、“区区万人之众”，打得中国“再战而陪都（指沈阳）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燬矣（被消灭）”。在对外作战中，清军军官

①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学说的创始人，进化生物学奠基人。认为物种形成及其多样性、适应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选择。著有《物种起源》等。

②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企图以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建立一个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哲学公式。所著《社会学研究》1903年由严复摘译，名为《群学肄言》。